

# 徐森玉与施蛰存的一段交往

——从《徐森玉全集》中一通书信说起

王圣思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徐森玉全集》（柳向春编，责任编辑崔燕南）。全书总计26万余字，分为论文、序跋、讲话及报告、书信、其他和日记残片等部分。书末附有柳向春所作《吴兴徐森玉年表》。

外公森玉老人（1881—1971）并没有留下多少他所擅长的文物鉴定文字。现存的六篇论文《〈郁孤台帖〉和〈凤墅帖〉》、《〈蜀石经〉和〈北宋二体石经〉》、《〈宝晋斋帖〉考》、《兰亭续帖》、《西汉石刻文字初探》、《〈兰亭序〉真伪的我见》等，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所撰，那时他已八十高龄，文中注明查阅资料往往都是青年同志代劳。

外公一生大半是以实地考察古迹、当场鉴定版本目录金石碑帖书画为主，与友人则以即兴交谈、书信往来居多。据说，当年琉璃厂的文物只要挂出“徐二爷鉴定”的牌子，立刻就有买家买下，当然，后来也有假冒的事情发生。台北故宫博物院庄严先生曾回忆，抗战期间在贵州安顺守护故宫珍贵文物时，外公曾有过多次关于鉴定、保护文物的漫谈，他都做了记录，可惜战乱中笔记本丢失，也就没能留下外公的经验之谈，甚为可惜。梅兰芳大师的秘书许姬传先生也曾记载“徐森老”从观察王国维先生著述研究“博专细”的方式，告知做学问写文章的秘诀，多少年后我读之依然受用。但外公自己却绝少著书立说。这些年来，上海博物馆柳向春博士尽心尽力到处搜集外公的相关论文、讲话、为他人所作序跋、书信等第一手史料，终于辑录整理成书，实属不易。

我对外公学术领域的专业知识知之甚少，常有无法企及之感。这次有幸帮忙校对全书，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长了不少知识。我发现书信一辑占全书的37%，其中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家

信，重读外公写给我妈妈的信，看他为妈妈欲赴欧洲与爸爸一起留学而思考了一夜，列出七条建议，仍为之感动，也倍感亲切。家信中发现有一通提到施蛰存先生（1905—2003），也让我想起一些往事。

1978年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曾旁听过施蛰存先生给77级学生上课，之后又随研究生同学一起去施先生家问学，对施先生的淹博学识印象深刻，尤其在逆境中仍然坚持研究学问，更是从精神上引领着我们学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我有时去看望施蛰存先生。一次，他与我提及抗战期间，外公曾到长汀，和在那边碰到。当时我记下施先生具体的回忆是：“抗战时期徐森玉从重庆飞到福建，在长汀厦门大学和我住过一阵。当时重庆飞上海的路线到江西中断，只好飞福建，然后走公路，经浙江杭州才能回上海，有不少朋友，我都是送他们走这条路线，我自己也是这样回上海的。”他对外公的印象是——“徐森玉学问好，研究古文献。”但他不知外公已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而且并没有留下多少著述。1941至1945年间施先生任教于因战乱迁到长汀的厦门大学。他与外公在福建相遇这件事，没听外公提到过。但在怀念施先生的文章中我记录了他的这一回忆。

这次校对家信，看到外公在福建长汀给儿子（文埤，字伯邓，1910—2002）即我大舅的一通信函，也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信中外公写道：

文埤知悉：余经营纸业，四日来临汀，市肆虽繁盛，而客棧极少。全城走遍，始得一榻可居，然污臭不堪。所事几经磋商，往返询问，顷得确信，成行有日，即作书告汝，望转告诸亲友。城西有苍玉洞，宋人题名刻石数十段，近年为修工者损坏多处。又北山之麓，有梅

万株，绿荫宜人。若初春来此，真香雪海矣。施蛰存写示《武夷诗》三十首，颇有大谢风趣。此地人物如鲫，而同调绝少，渠甚念馨迪不置。上海生活日高，汝事宜小心，至要至要！此询近佳。父森字。六月八日

过去老人们通信一般不写年份，往往只落款月份日期，幸好此函留有信封，邮戳清晰，寄出为长汀“卅四年六月八日”（1945.6.8），收到日期是上海“卅四年七月十一日”（1945.7.11）。战乱期间道路受阻，此函路上竟走了一个多月！那时日本还没有宣布投降，所以施先生回忆“抗战期间”，是准确的。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9月初版）作者沈建中先生提供施先生那一时期经历的史料如下：“一九四五年七月下旬，先生应戴克光之邀，与邹文海、万鸿开以及周长宁、叔园等诸位教授一起脱离厦门大学，迁居福建三元接受江苏省立江苏学院之聘，出任文史学系教授。”“九月一日，先生正式出任省立江苏学院文史学系主任、教授，月薪为400元。”所以，在此之前的6月上旬，外公与施先生确实在长汀见过面。

与施先生回忆外公是从重庆飞福建略有不同，实际情况可能是倒过来，外公从上海出发，经浙赣闽，最后从福建再赴重庆。1945年开始，外公的家信写得含蓄，对收信人的称呼、写信人署名往往用代称，或换一种不同的表达，所谈之事也多用暗语。可能时局变得更紧张，所做之事也需更小心，因此写得更为隐晦。如此，信中外公所谓的“经营纸业”，柳向春博士认为恐怕不是实指，而是指与古籍调查运送相关之事；他所作年表提及1945年“先生曾再次赴渝，约八月间返沪”。从家信可见，外公在1945年4月27日从上海抵浙江杭州，28日游湖，29日品茶——5月3日

从杭州起行——4日抵场口，夜宿商元——5日泊八铺汊——6日经桐庐，船过七里泷，登钓台并西台——7日到建德，食角黍，味颇佳——又到一地（未写日期地点），候车二日——直到12日才由淳安乘车前进，因车机损坏在仙岭住宿——13日车机又损坏三次，夜二时抵稻坑宿——14日车机坏两次，饭于华埠，夜宿常山——15日过江西玉山，抵上饶——16日来铅山——25日从铅山起行，渡分水关（赣闽交界处），山峻路险，幸车机甚好，未稍停滞。午饭在福建崇安（铁观音茶价甚廉），过赤石，饱看武夷山色，晚抵建阳——26日过建瓯，游街市一周，下午二时抵延平，市中颇繁盛——27日抵永安，梅雨已至，诸溪水大涨，闻前途桥断路坏——候车二日，29日来朋口——6月4日来临汀——6月8日信函提及成行有日。

可见外公一路确是走公路，坐汽车或渡船从浙江、江西来到福建的；施先生所提从福建回沪路线大致也是如此反方向而行。外公信中将长汀称为“临汀”，系因长汀古时称汀州，临汀曾是汀州之别称。

施先生“写示《武夷诗》三十首”，外公评价“颇有大谢风趣”，大谢是谢灵运，擅写山水诗，此语颇见外公于旧体诗的鉴赏趣味。据《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记录，1941年5月下旬，施先生由永安出发前往武夷山旅游，独行山里十天。又在1942年元宵节，为编定誉录所作诗《武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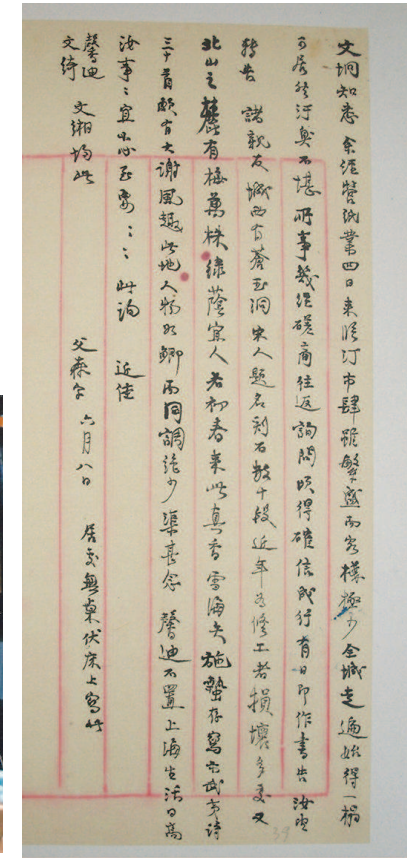


柯灵、施蛰存和王辛笛（至左自右）

行卷》（一卷）题序：“既归永安，又仆仆来汀州；逾月，始得展席定居，遇发篋出宿薰，时一润色之；至岁阑，遂写定为卅五首，曰《武夷行卷》，录以谗亲戚故旧睽违既久且远者。”此时已至1945年，大约施先生从中特地抄录了三十首自己较为满意的诗作送给外公。施先生《北山楼诗》选有吟咏武夷山水的诗二十余首，第一首即拟人化颇带风趣的《入武夷先见玉女峰髻秀绝伦》：“开门临白水，对镜贴黄花。独宿清溪畔，娉婷惜鬓华。年年三月半，日日夕阳斜。莫逐行云去，行云未有涯。”

此信又写了长汀风物景象，特别提到“城西有苍玉洞，宋人题名刻石数十段，近年为修工者损坏多处”。略早在1942年秋间，浦江清先生返回西南联大时，途经长汀，由施先生陪同参观苍玉洞，皆可见当年学者对祖国文化遗迹的重视。

外公信中反映了他逗留长汀与施先生交游，还提到施先生“甚念馨迪不置”。馨迪（1912—2004）是父亲的本名，



徐森玉从福建长汀写给儿子的信

看来父亲与施先生此前已相识，也许是他俩都写现代诗，而施先生与戴望舒先生是好友，父亲又曾在戴望舒编的《新诗》上发表诗作。我只知道他俩在四十年代后期有来往。施先生也曾谈起那时他到中南新邨我家做客，还记得“你家的栗子粉蛋糕极好！极好！”当时施先生和几位友人在我家聚会，父亲赠送了刚出版的诗集《手掌集》，封面是英国版画家莱昂罗·赫米斯的作品——手掌上的一朵花，而父亲不取作者所起的《花》之名，而是看重与自己诗作相应的“手掌”之意。但直到五十年后，在亚洲文学作家文艺基金会访问团授予上海文坛三老作家施蛰存、柯灵、王辛笛敬老奖时，父亲和施先生才再次见面。

为施蛰存先生作百万余字编年事录的沈建中先生建议我写下外公和施先生交往的这一段史实，那样施先生以前的回忆就不是孤证，而有了旁证。我遵照办。适逢冬至临近，谨以此小文怀念早已仙逝的外公、施蛰存先生和父亲三位老人。

## 帆 楼

郑 宪

帆楼是我为它取的名。帆楼的外观是米黄色的墙，延伸约百米，东端身形扩展，西端慢慢变窄变扁，法式与西班牙式建筑风格的混搭，活泼，热烈，精致。整幢错落感的楼，参差高低，还有透气的两根一高一矮的烟囱。整栋楼矗在向下的衡山路及永嘉路间，由东向西，上下三层，形如一叶黄色的船帆，破浪而行。

之前我曾担心，这帆楼该只在记忆里了，城市建设与更新的洪流，应已将其淹没，徒留一番失去的悼念。但走到跟前，竟还见它亭亭玉立。只是整个建筑身形似小了。像个人，历经岁月，步入晚境，会缩身，变矮，甚至，有点暗旧。

这是玄霄过去的家，小时候，我曾仰视它，觉得高大，在楼下，抬头看他家三楼向街打开的百叶窗和褐色屋檐。然后，伸手摁门铃——是个塑料红点的电子门铃，然后大门的锁会喀嗒打开。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算非常奢华的装置。我旋开绛紫色厚重的大门，步上一格格黑褐色的实木楼梯台阶，脚下响起充满年代感的咚咚回响。至三楼，他家在楼梯转角后第一家。人一踏上三楼，他家的门已打开，玄霄或他母亲，站立门口，迎客到来。

八十年代初，玄霄离开上海。但我们有联系。几年前，我去美国，到北加州，他在内华达，和我电话聊：你来不来我这里？我问：你来加州不方便？他住的地方，深山密林间，景色优美，森林覆盖率高，人在天然氧吧里。他的居家面积大，有花园和迷宫似的屋，但房价比加州低廉许多。在美国的朋友说，他现在躲进深山成一统，遁世了，和他的淡泊性情适配。他有家事，无法来加州，我在美旅行时间紧张，顾往他地盘，加州一圈朋友安排的活动都要歇菜。只能错过。彼此在电话里倾诉：遗憾了啊，遗憾。

然后，便说起他在上海住过的帆楼。他在电话里轻语，“是你起的名？噢，蛮贴切。”接下去，是长久静默。

和他初识，在一个小学一个班，他当过少先队中队学习委员。我们共同爱好乒乓球，隔网打过好多次，他对输赢很淡。接着，是动荡年代。小学毕业的一个日子，我们在学校外的高安路，阳光斑驳的梧桐树影下，挥手相别。从小他的天际就光亮饱满，大脸盘红红，很福相憨厚。后来，我走进康平路上的中学校门。新生有11个班，在人流拥挤的教室走廊和他不期而遇，彼此喜悦而矜持：原来又在一所中学，尽管不同班。一天，在大操场，他出现在我身边，拍一下我的肩，发出第一次邀请：“来我家吗？”

中学毕业是七十年代初，我又被分配在同一工厂，同一间宿舍。他分在金工车间，我分在高温的锻工车间。工种分配毕，一厂领导叫我到一边，说：有人要和你换工种，说他身体条件比你

好，更适合重体力活。是玄霄。我感动。人生第一次被不是亲人的外人异常关心。我拒绝了，但感激他，要报答：请他到我们车间小澡堂洗澡——我的车间虽然脏、热、累，却有个独立锅炉，

一个干净澡堂，池水常清绿，只对本车间人开放。他洗完澡，原本红红的脸更红润，一副心满意足，“享受啊。”说话时，他人站在滴水的湿凳上，一件件套上衣裤。

然后是他报答我：凌晨5点多，我们起床上早班。洗漱毕下楼。出门对面是老正兴饭店。他大步流星，抢付我的餐费：一碗干挑阳春面，有葱花有油酱，喷香爽滑，一碗甜豆浆或咸豆浆，一根油条，一只菜包子或肉包子。一共两角左右。

学徒两年满师时，他独自闯荡了当年还很荒蛮的黄山，回来对我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恢复高考，在别人还懵懂时，他的录取通知已先抵达。他儒雅宽厚的外形蒙蔽了许多人——天生，就是个不甘于现状的开拓者？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夜晚，我们几个好友，一起往他住的帆楼。那天的心情都复杂。是一次特殊送别。他大学刚毕业，留校未及半年，便辞职出国，不日后成行。那时越洋万里迈出国门的事例极少，觉得难以想象。而安排他出国的，是他不久前病逝的父亲。

玄霄的父亲为上代知识分子，早年出国，船舶教授。再具体的身份背景，雾一样模糊。当年我们同学间，互不打听父母辈的如烟故往。因不少人的上一辈，说出来，会触碰到难以启齿的“历史问题”。他父亲去世前两年，一直躺在朝南的大屋内。阔高的屋内有张宽大的床，阳光时有射入，五斗橱上有龙飞凤舞状的玻璃镜。大床上的父亲，有时静睡，有时斜靠床头，满头发灰，瘦削的脸，让一副架在鼻梁上的玳瑁眼镜显得过大，还伴阵阵咳嗽。知道他父亲有重病。所以当年一次次上门，心有不安。

行前的话语显得凌乱，他刚坐下和我们说几句，就被人呼出，脚无法着地。我见他脸上有努力释放的尬笑。有那么几分钟，我与她母亲独处。她当年是数学老师，慈和温善，姿态优雅的知识女性，话语轻慢，思路清晰：“玄霄不愿去呢，但父命如天。国外有他爸爸的一个老同学在等。”

当年，我们还面临一项托付：有空来看他母亲。他只有一个哥哥，比他矮小，印象中是个巧舌不实际的人，而他的沉稳智慧不同类。他离开时，最痛楚牵挂的就是孤孀的母亲。

故年复一年，我时常去帆楼，看望他母亲。但去看的时间间隔越拉越长。城市在翻新，帆楼在陈旧。步上木楼梯的咚咚声，像在听历史回响。先是见到帆楼对面，建起一幢崭新现代的新

闻大楼。再后来，看到帆楼下的附近，建起漂亮雅致的地铁站。道路也在齐整拓宽，周围不断矗立一栋栋新楼。但体现老上海遗存的旧房子，也在新建筑间穿插呼吸，比如这帆楼，便顽强表达着过往的见证，虽然内里在隐隐溃散，像他的母亲，越来越衰弱。路边粗茁的梧桐树，树叶年年发，年年随风飘落。喜与旧，在此互见。

他已无法回转。在异国，他先放弃了当科学家的憧憬，之后转行成华尔街一高级白领，投资经理人，意气风发地在纽约，在高档写字楼间穿梭。所有关于他的讯息正面而令人惊叹。但他的母亲依旧在帆楼，如一枚长长的铁钉，深深锤入老建筑坚硬的内核。他对我说，多少年了，始终无法说服母亲前往他在国外斑斓的世界。帆楼是她的根。“母亲不愿在外漂洋。”

千禧年到了，又一段长长的日子

后，我再去帆楼，见他那一个人住的母亲。所有的门窗紧闭，一个憔悴的

老者。一头雪白，额脸上深犁泥土似的皱纹沟壑，行路颤颤巍巍。再是语言的

缓滞，思路的混沌，答非所问的经常。

岁月的残酷伤害，到人的晚境，会加倍数

扑来，而在他母亲身上，似尤重。更可

怕的是，说起她曾经为之骄傲的儿

子，时不时，一脸的不识与茫然。

我在越洋电话里呼唤：“你要快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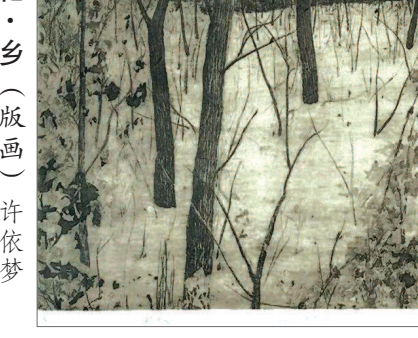
来。”他说：“如果妈妈一定不过来，我回

上海了！”

悲剧有时是注定的，但末料想会如此惊心。他越洋回家，万里飞行，在春节兴致勃然归帆楼。清晨的阳光很好，稍带寒意。而迎接他的，是前一夜，母亲在帆楼的家中，生命蓦然止息。

所有他给母亲寄来的钱，她分文未用，妥妥地安放好——她头脑清晰时写下了遗书，说明它们的存放处。之后，那两间宽大、高阔、有历史韵味的老屋，终是换了陌生主人。

那日，烂漫斜射的夕阳下，想拍几张帆楼的照片给玄霄，想拍帆楼周围的衡山路，永嘉路，高安路，再走远几步的康平路，我们一起读过书的小学中学。通过网络和微信寄往，存念。再一想，罢了——这帆楼，这帆楼周围的景物，于他心里，一定刻骨地在，即便他住到了那么远那么远的深山密林里。



忆·乡（版画）许依梦

## 露珠与珍珠

杨闻宇

倘说朋友像是露珠，那么，“知己”就是珍珠了。露珠与珍珠一样新鲜，如果想要在露珠里觅得珍珠，很难。

朋友的原初本义，指彼此友好、互为照应的熟人。因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沿袭成习，致使许多人初次见面，一开口就称对方为朋友。随意拉扯，随处使用，“朋友”二字也就泛滥了。更糟糕的是，有些朋比为奸者也以朋友相许，酒肉场合吹吹拍拍，信誓旦旦，摆一副要为对方两肋插刀的架式，实际上尽都是唾沫乱溅的谎言浪语，当利益冲突白热化时，能不背后捅刀子，就算“够朋友”了。层次不同的朋友是个开放性的名词，维持着友谊层面最大程度的平衡，真正的朋友非常难得，是因为真朋友切近于“知己”的范畴了。

年轻人热衷于交友，仿佛满眼都是朋友，不在乎什么“知己”。世途翻覆，好事稀罕，直到在朋友圈里喝水多了，被呛得够了，这才明白多数朋友仅仅是“过客”，也才开始留意“知己”二字的含意。“彼此了解而情谊深厚的人”就是知己，词典这样解释，似乎模棱两可。大相径庭的朋友与知己，是在一个人成长的进程中渐渐划开界限的：朋友，像是进程水浅处的许多人在扑腾不止，而知己，则像是岸远水深处难得一见的稳步跋涉的独行者。能在大浪淘沙中留到最后的朋友，往往才是真朋友，真朋友，才有化为知己的可能性。

一个人成长途中，朋友会剥笋一样减少，也只有在失意、寂寞、孤独的环境里，这才有可能遇到知己的种子所冒出的萌芽。知己的萌芽，是在友情的基地上逐渐生长而形成的。换个比喻：知己如果是一株珍贵花卉，艰难境遇里的友情便是培育它的肥沃土壤；那些看风使舵、隐伏着功利算计的“朋友”，只是垃圾凑合成的瘠薄泥沙，在泥沙里，结缕知己也就没有形成的根基。

聚首的朋友们红火热闹，动辄大呼小叫，而知己之萌芽，是内敛的、静默的。朋友的热闹与泛滥，暗暗衬托着知己的冷静和珍稀。现在时兴手机，“朋友圈”那么多，为什么就见不到一个“知

己圈”呢？可见连环交织的朋友圈与“知己”二字的缘分是多么淡薄。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生死相依，这些知己范畴的令人神往的词句其所以一再降临于笔端，落于字面，可能正是因为现实中太稀罕，太难逢了罢。

有人或许要问：结为连理而白头偕老的夫妻，难道算不上知己吗？年轻人初恋时，称对象为“朋友”；发展进步而同入洞房，升格为夫妻；生儿育女，银婚，金婚，情意深笃，相依到老，这是岁月碾下的深深的辙印，誉之为“知己”，倒也无妨。至于能否晋升为真正意义上的“知己”，可是要斟酌具体情况了。旧时的富翁妻妾成群，当今的贪官情妇联袂，“文革”中出现过夫妻翻脸要划清界限，眼下时或出现的一夜情、性伴俱，尽可以证明，性爱与情爱并非一回事，即就是合理合法的夫妻，由情爱层面要步入醇正的知己层面，也绕不过一个逐渐成熟的磨合进程。夫妻之间，锅碗瓢盆，磕磕难免，虽然朝朝暮暮，耳鬓厮磨，也还要的是互相体谅，彼此关照，紧紧携手，努力不懈地步入知己的境界。

异性之间的感情，神秘、微妙，易于切入“善解人意”的爱情层面，一旦喜结连理，晋升为知己的指数毕竟会高出一筹。例如，陆游与唐婉、鲁迅与许广平、高君宇与石评梅、傅雷与朱梅馥……相濡以沫，人神共睹。当然，这等高超拔于尘俗的知己境界，风波起伏兮受河九曲，毕竟是曲折磨合形成的，其间都有一个互动深入、熔铸淬砺的时序与过程。

友情、爱情和亲情，是这个世界上产生温暖的源泉。朋友圈历来是分层次的，虚与委蛇者有之，锦上添花者有之，雪里送炭者也有之，如果知己也可以归入感情的宝塔，它分明是这座宝塔上的金顶了。真正的知己境界，别有洞天。“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此言涵义深矣，挑明人生之知己，只能是凤毛麟角。人情如云似水，周折繁复。露珠常见，珍珠稀罕；朋友易得，知己难逢。朋友与知己，质地大异，彼此却是藕断丝连。朋友满天下，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知己难寻觅，却也是避免了宴席散伙之后的寥落。人生本质上是孤独的，缘浅缘深，缘起缘灭，很难估量，人生所持的正常心态应当是“莫愁前路无知己”。要留意的是，“莫愁”不等于大而化之，倘是巧遇机缘，切莫掉以轻心，否则，“知己”之大幸，也只能是稍纵即逝的电光石火。

朋友与知己，是一道不易分解的难题。倘有人问我：“你而今80岁了，有知己吗？”我会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回答……

## 笔 会